

第五屆「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鄭成功、劉銘傳】

2003年4月25~26日

殖民地時期日人眼中的清代台灣文學

黃美娥

政治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一、前言

1895年，日本取得台灣這個殖民地，面對新鮮而陌生的「異地」，日人有其特殊的「看待」方式，也衍生了各式的殖民論述。以文學為例，在帝國之眼的凝視下，歷來最為人熟悉的便是1941年5月，任職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的島田謹二發表於《文藝台灣》2卷2號上的〈台灣の文學的過現未〉一文，文中雖然承認台灣的文學與日本內地的文學有異，但被視為「外地文學」的台灣文學，在島田筆下是作為「日本文學的一翼」而存在的。島田明確「收編」台灣文學於日本文學中的舉動，日後也激化了1942年至1943年間黃得時有意建構台灣文學主體性格所進行的文學史書寫，此即一連串刊登於《台灣文學》上的〈晚近の台灣文學運動史〉、〈台灣文學史序說〉、〈台灣文學史（二）〉等文¹。不過，日人將台灣文學納入日

¹ 注意到島田謹二「外地文學」的論者不少，早期以葉笛〈日據時代的「外地文學」論考〉一文較為重要，葉氏並且翻譯了島田〈台灣の文學的過現未〉全文；近來較出色的討論有井手勇《決戰時期臺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第二章第三節〈日人作家的臺灣文學觀・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1），以及橋本恭子〈關於島田謹二《華僑島文學志》的研究對象〉、柳書琴〈誰的文學？誰的歷史？——論日治末期末文壇主體與歷史詮釋之爭〉二文。至於黃得時台灣文學史書寫的相關論述尤多，單單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在2002年11月22日至24日所舉辦的「台灣文學史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便有多篇論文提及黃氏的貢獻，如陳芳明〈黃得時的台灣文學史書寫及其意義〉、陳萬益〈論台灣文學的「特殊性」與「自主性」——以黃得時和葉石濤的論

本文學一環的說法，難道遲至 1940 年代才浮現檯面嗎？目前，雖有論者注意到 1935 年以後，日人曾經出現若干帶有整理與書寫文學史意味的評論，有利統治者及在台日人作家文學史意識的形成；且也發現島田有關「外地文學」史觀的醞釀成形，可以追溯到 1935 年至 1938 年間²。但實際上，筆者發現早在明治時期，就已有日人將台灣文學視為日本文學的一環，倡言「文壇的地方分權」論，以為台灣文學可替日本文學增添勢力，進而貢獻世界文運³；甚至也有直接提出「殖民地文學」的說法⁴。由此看來，有關日人建構台灣文學為日本文學一翼的系譜歷程，實有從頭追溯之必要。

另外，在探索殖民地時期日人對於台灣文學的評價與定位時，一般的研究視角，在時間上多侷限於「戰爭期」；在對象上，則以「新文學」為主，未見針對日人所論明鄭到清代台灣古典文學的看法進行探究，有鑑於此，本文擬以日人眼中的「清代台灣文學」為觀察範圍，就此議題加以說明。再者，清國原是台灣的宗主國，今既已成為日本的戰敗國，則整理、評論清代的台灣文學成果，對於日人而言，更隱藏著種族競爭與文化較勁的張力關係，愈加耐人玩味，這也是本文於此著眼的原因之一。

二、民俗/文化/文學場域下「清代台灣文學」知識系譜的建構

(一)

領台初期，日本來台官員不乏漢學素養，若干幕僚也喜漢詩創作，透過漢詩作為媒介，水野遵、土居通豫、加藤重任、黑江蛟、岡本韋庵……等，或與台人進行官紳雅集，彼此唱酬；或徵詩交流，挖雅揚風，遂使清朝以來台灣漢文學創作傳統不致中輟，得以延續。而這些來台日人，面對台灣景物，充滿異國情趣的好奇與新鮮，下筆之際，詠景、記遊頗多，如來台擔任過陸軍郵便局長及民政部郵便局長的土居通豫，在 1896 年七月底

述為主）、林瑞明〈兩種台灣文學史—台灣 VS 中國〉、彭瑞金〈從台灣文學構成的要件審視文學恐龍主義〉……等。

² 參見柳書琴前揭文，台灣文學史書寫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同上註，頁 8-10。

³ 此意見為後藤外氏所提，相關介紹參見蘇來〈應該如此才對〉，文載《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5：9），頁 134。

⁴ 參見小松吉久〈殖民地文學・臺灣風趣的發揮〉，文載《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5：10），頁 153。

到八月初，陸續發表歌頌台北八勝的詩作，其後又有遊北投之作；又如擔任芝山岩第一附屬學校教諭的小田深藏，1896 年來台之初，也有遊芝山岩、劍潭作品多首。不過，台灣島嶼的山光水色，雖然不難獲見於日治初期日人的漢詩中，但對於台灣的文化歷史、人文風俗的掌握，日人猶感陌生，也因此，有關日人評價清代台灣文學的論述資料尚屬罕見。

(二)

依筆者目前所知，日人中較早蒐集清代台灣文獻而進行相關介紹，或留意到文學發展概況而予以評述者，當以成立於明治 33 年（1900）的「台灣慣習研究會」最具代表性。此一組織是由台灣總督府暨法院官員所組成，發起委員共有後藤新平、石塚英藏、村上義雄、木下周一……等三十三人，最後推舉兒玉總督為會長，後藤新平民政長官為副會長，高等法院院長鈴木宗言為總幹事，伊能嘉矩、小松吉久等七人為幹事⁵；並刊行《台灣慣習記事》雜誌，自明治 34 年（1901）1 月至明治 40 年（1907）8 月，共發行七卷。此會的設立，是有感於民俗習慣的認知是施政的重要參考，日本在領台之後，雖然銳意從事調查，可是尚未調查者仍多，其以為習俗調查之事，未必須通盤委任政府，因此上述有志之士，就另闢研究管道，以業餘從事調查⁶。該會的辦事處雖然設於台北，但卻有駐在各地方的委員，可以從事該地方的舊慣調查工作⁷，因此能夠較為全面地蒐羅到台灣全島的慣習民俗資料，而作出概況的說明。例如 1901 年會員關口隆正，由於擔任台中辨務署長之便，曾就台中地方移民的狀況進行調查，發表有〈台中地方移住民史〉，文中提及當地移住民的職業、生活及教育變遷狀況，而在回顧清代台中教育考課的情形時，對於該地富家子弟花錢請人代作文章的惡風加以批判，且進一步對清代台灣文人的學問與文章表現，作了如下的評語：

……台灣的學問，文章更為淺薄無比，勿論舉人亦好，秀才亦好，徒

⁵ 參見《台灣慣習記事》〈會報〉、〈台灣慣習研究會會則〉中譯本（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第 1 卷第 1 號，頁 27、頁 30。

⁶ 參見《台灣慣習記事》〈發刊辭〉，同上註，頁 1。

⁷ 參見〈台灣慣習研究會會則〉第一章「總則」及第三章「職員及其任務」，同註 3，頁 27、頁 28。

有其美名，而無其實，殊不足怪矣⁸。

這種依附於舊慣習俗調查所產生的清代台灣文化/文學知識，是否深入而客觀，值得商榷，但關口隆正此段概括式的敘述文字，強烈貶抑了清代的台灣「文人」及「文學」的措辭語氣，卻令人印象深刻。

在多年的舊慣調查中，擔任幹事的伊能嘉矩，可說是當時對於清代台灣文獻/文學接觸最多的人。自1895年11月來台，1906年返日止，伊能嘉矩在台約十年⁹，起先從事以原住民為主的人類學研究，而後逐漸轉向漢人及其相關歷史的研究，1901年前後，開始頻繁地於《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慣習記事》發表短文¹⁰，絕大多數的主題攸關漢人民俗或歷史，已大幅度淡出原住民的研究¹¹，而其對於清代台灣文學/文獻的若干看法，也開始出現於此時的文字中。

以《台灣慣習記事》上所載諸文為例，伊能嘉矩使用「梅陰生」為筆名發表〈我的書架（第一架）〉《東征集》六卷（2：2）、〈我的書架（第二架）〉《海天玉尺編初集二集》二卷《珊瑚集》一卷（2：3）、〈我的書架（第三架）〉《裨海紀遊》六卷（2：6）、〈我的書架（第四架）〉《治台必告錄》八卷（2：9）、〈我的書架（第五架）〉《海國聞見錄》二卷（3：6）、〈我的書架（第六架）〉《聖武紀》十四卷《鹿洲初集》二十卷（5：7）等文，這些都是針對清代台灣文獻而寫的介紹文字，依其自況：

破窗敝几之假寓，素來非有汗牛充棟之書，惟隨見而收集，隨聽聞而

⁸ 參見關口正隆〈台中地方移住民史〉，文載《台灣慣習記事》中譯本（1：6），頁183。

⁹ 伊能嘉矩，1867年生於日本遠野南部藩城下町遠野町橫田村新屋敷（今岩手縣遠野市東館町），1925年因瘧疾復發而亡。關於其在台時間，說法有二，吳密察〈從人類學者到歷史學者〉，頁45，言其於1906年1月離台返鄉，結束在台十年歲月；荻野馨〈在日本內地的伊能嘉矩〉，頁23、頁24，言其於1895年11月來台，至1908年2月回鄉，其間1898年12月至1899年12月待在日本內地，故總計在台前後約12年，二文見夏麗月主編《伊能嘉矩與台灣研究特展專刊》（台北：台灣大學圖書館印行，1998）。另，板澤武雄〈伊能先生小傳〉也載為十年，文見《台灣文化志》中譯本上卷，頁18。

¹⁰ 除《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慣習記事》外，伊能嘉矩在其他報刊所發表的論述亦甚眾多，日人江田明彥著錄極詳，文見夏麗月前揭書，頁120-183。

¹¹ 關於伊能嘉矩從人類學者到歷史學者的轉變與相關成就，以及從原住民研究轉向漢人研究的相關過程，可參吳密察〈從人類學者到歷史學者〉，同上註，頁35-45。另，有關伊能嘉矩在台灣原住民研究的貢獻與局限，陳偉智〈殖民主義「蕃情」知識與人類學—日治初期台灣原住民研究的展開（1895-1900）〉（台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8）已有清楚的分析。

寫，供坐右餘師者若干冊，就中，摭拾其與台灣有關係者，作解題¹²。

由於隨見隨收、隨聽隨寫的好習慣，因此伊能氏對於台灣文獻頗有收藏與瞭解¹³，為提供讀者參考，乃試作解題。那麼，伊能嘉矩的「解題」文字，究竟涵蓋了何等內容？以《東征集》的相關說明看來，伊能氏首先介紹作者及撰著動機與背景；其次提及本書所見版本；而後言及該書內容、價值，乃在於「有關朱亂靖平，作戰之計畫，戰後之謀略，其中不啻有益於資補歷史，並可窺知當時之民情，地形之變遷，有所謂稽古以繩風猷於既頹，照今以補典教於欲絕之實，而其論策百篇中，如覆制軍臺疆經理書（卷三）、覆制軍遷民劃界書（卷三）、論台鎮不可移澎湖書（卷四）、……，於今仍有取則價值者……。」（2：2，頁80）；接著亦論及書中間有杜撰之弊，讀者需加留心考究；末了則觸及《東征集》的文章藝術表現，嘉許部分文字高潔，出以春秋筆法，更有可視為經世文字之處。由此可見伊能氏對於此類文獻的高度掌握與認知。

除上述介紹專著的文章外，伊能在《台灣慣習記事》雜誌上，還曾針對藍鼎元、鄭用錫、陳璘、沈葆楨、劉銘傳……等人，撰寫專文予以介紹，尤其是藍鼎元、鄭用錫、劉銘傳更是給予高度評價，這些評論意見多少涉及了清代的台灣文學。不過，上述這些或屬解題，或屬介紹評論的文章，多數意見已被收入其日後完成出版的《台灣文化志》中，因此，考究本書的內容，就成了掌握伊能嘉矩清代台灣文學相關意見的最佳捷徑了。

有關《台灣文化志》這本書，大致完稿於1916年，初名《清朝統治下台灣文治武備機關之變遷》，原本是伊能向文部大臣提出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的申請書草稿¹⁴。1925年，伊能因瘧疾復發死亡，1928年在友人門生相助下本書得以出版，並因柳田國男、福田德三、板澤武雄的商議，

¹² 語見伊能嘉矩〈我的書架（第一架）〉，《台灣慣習記事》中譯本（2：2），頁79。

¹³ 伊能嘉矩收藏的清代台灣文獻，並不只《東征集》、《裨海紀遊》數種而已，在伊能文庫中所存尚有刊本及抄本數十種，包括地方志、公文、契約等史料；以及吳子光《一肚皮集》、《小草拾遺》、鄭用錫《北郭園全集》、江日昇《台灣外記》、黃叔瓚《台海使槎錄》、楊希閔編《台灣雜詠詩》……等較具文學性的著作。參見吳密察〈台大藏「伊能文庫」及其內容〉，文見夏麗月前揭書，頁52-56。

¹⁴ 參見楊南郡〈伊能嘉矩與台灣平埔族〉，文載夏麗月主編《伊能嘉矩與台灣研究特展專刊》，頁88。不過，荻野馨〈在日本內地的伊能嘉矩〉，以為原稿本無題，頁29。

定名為《台灣文化志》¹⁵。書中第五篇〈教學之設施〉，所論議題與本文較有關連，其內容依序包括「學校之教育」、「教學之鼓勵與藝文之振興」、「右文間接之影響」、「圖書蒐集」、「考試」、「教化之實行」、「人文之特殊發展」等七章。其中，第二章、第三章、第七章所論頗多涉及清代台灣文學，其他章節的記載則多少或與清代台灣文學間接相關，亦可視為輔理解清代文學興起的相關背景說明。

以第二章〈教學之鼓勵與藝文之振興〉來看，該章言及清代來台官員及本地儒士，啓迪文風、作育菁莪的經過，藉由蔣毓英、季麒光、林謙光、陳璘、夏之芳、朱景英、鄭兼才、謝金鑾、鄭崇和、郭成金、蔡廷蘭、周凱、姚瑩、蔡國琳……等事例的介紹，伊能肯定清朝政府治台的教化貢獻，尤其首段即開門見山指出：

台灣在清代二百年間，不問其在官抑在野，均致力於教學之鼓勵，並努力於藝文之振興，其為一代之師表，而興起後賢著有功績之士，不乏其人。（中卷，頁37）

顯見在伊能眼中，清代台灣的教育及藝文風氣頗盛，導因於在官在野賢士推贊有功。

而第三章，除部分提及文人的書畫藝術外，其餘大半篇幅所論正是攸關清代台灣文學的發展梗概。文中，伊能首先稱許台灣古有海東鄒魯之稱，因此認定此地寓賢隱逸，文風不弱。接著依照時間先後介紹，包括郁永河、陳璘、季麒光、孫元衡、阮蔡文、卓夢采、黃叔瓚、黃清泰、黃驥雲、郭菁英、林樹梅、陳維英、鄭用錫、林占梅、查元鼎、黃敬、曹敬、陳肇興、楊克彰、劉銘傳、唐景崧、施士洁、丘逢甲、林啓東、陳朝龍……等清代文人。就其所介紹的文人看來，雖然能夠兼顧流寓及本土文人，唯所列本土文人多偏於北部，中南部則較少。

從引據的文獻資料看來，可知上述兩章內容的撰寫，伊能嘉矩至少參考了地方志、作家詩文集、連橫《台灣通史》、王松《台陽詩話》、台灣總督府編《台灣列紳傳》、《台灣時報》、《台灣日日新報》等報刊書籍，不僅採擇了台人既有的相關成果，也涵蓋了現時性的報導資訊。細繹上述兩章的內容及評述視角，可以發現伊能氏在論述清代台灣文學時有二個特

點，其一，特別重視作家的品德操守，且強調身教的教化作用與影響，所論普遍偏於作者節行的陳述，其文藝表現反成文章末節而非主幹，甚至有時忽略了文藝表現的介紹，如康熙年間澎湖人許福基（頁50）、雍正年間諸羅黃孟深（頁51）……等，其行誼與文學藝術皆無涉。其二，伊能在介紹明鄭到清代台灣古典文人及作品的同時，也記載了漢人時興的民間文學，於此可知伊能嘉矩不只注意到菁英份子的古典文學創作，也能留心庶民階層的民間文學，雅俗兼顧，此種文學觀點的形成，與其投身民俗研究不無關聯。

另外，在第七章〈人文之特殊發展〉，伊能從民俗文化的角度出發，注意到台灣人文的特殊發展，其實已與中國有所不同而有其自我特色。文中，他先從風土、族群、語言差異等因素一一考察，闡釋台灣人文形成特殊發展樣貌的關鍵原因，繼而在文學表現上，他藉由幾則攝取自中國稗史但卻能涵融台灣風物的台灣文學作品為例，清楚鉤抉出台灣文學取諸中國文學，卻又能脫胎換骨的面目。例如，《彰化縣志》中有關「繡孤鸞」山（或書「秀孤鸞」）的「叢談」介紹：

繡孤鸞山麓皆菊花，有能結實者。老番不知幾百歲，相傳海中有一浮嶼，上皆仙人所居，奇花異草珍禽馴獸，每歲初冬，則遣一童子，獨駕木小舟，到繡孤鸞，遍採菊實。番有從童子至其處者，歸則壽數百歲，猶依稀能憶其概。或童子不來，欲自駕舟往尋，終迷失水路，未知其處。唯隨童子往返者，登舟瞬間即到。山無城市，只有人家，至今相傳以為仙山云。（《台灣文化志》中譯本中卷，頁118）

方志中所描述的對象是台灣東部的繡孤鸞山，但卻援引了《史記》中渤海三神山仙人與不死藥、《荊州記》裡居民飲南陽菊水皆長壽等傳說，進以形塑出屬於本島繡孤鸞山麓特有的仙跡色彩。另，乾隆時期卓肇昌〈古橘謠〉、范咸〈台江雜詠〉「洞中橘樹爛樵薪」句，在記載鳳山縣岡山的奇聞時，則是移植了陶潛〈桃花源記〉「再訪迷失其址」的構想，以及《幽怪錄》「橘中有叟」的仙、橘故事，蒼萃而成岡山奇談。這些都是在中國原生故事的骨幹披上一層具有台灣色彩的外衣，轉身一變而為具有本地風土精神的文學作品。以上伊能的觀察，凸顯了台灣地理空間的涵攝與轉化功能，遂使本地的文學表現有了在地色彩的特殊性。

¹⁵ 參見荻野馨前揭文，頁29。

(三)

在伊能嘉矩之後，曾任《台灣日日新報》漢文部記者及台灣總督府囑託、台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員的尾崎秀真，也發表了數篇與清代台灣文學有關的論述，如〈清朝治下に於ける台灣の文化〉、〈台灣の詩人と詩社〉、〈清朝治下に於ける台灣の文藝〉……等文，由於其在台灣文壇極為活躍，故所論堪稱三〇年代日人評價清代台灣文學的代表性論述。

尾崎秀真，明治七年（1874）生於日本崎阜縣加茂郡西白川村，在日本曾經擔任報社記者¹⁶，於1907年左右來台，頗擅漢學，尤精書畫，珍藏逸品甚多，與台籍文人時相往返，備受推重。在台既久，對於台灣事物自是熟稔，1927年，撰寫〈傳説の台灣〉，探討歷來台灣的相關傳説，文中特以蓬萊山及仙人故事為例，說明台灣歷史早與日本一脈相連，有其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¹⁷。1929年元月，新竹文人倡設書畫益精會，並主開全島書畫賽會，尾崎秀真被推舉為審查員之一，後來入選之書畫於同年付梓流傳，名為《現代台灣書畫大觀》，編者黃瀛豹又敦請尾崎秀真撰寫書序，地位崇高，可見一斑。序中，尾崎連帶提及清代新竹地區的文學表現，以為：

新竹由來為全台文化淵藪，道光之際，鄭用錫、林占梅諸先哲提倡文學，誘掖後進，其流風遺澤，至今不衰。改隸以還，文運日進，學術之興隆，駸駸乎燦然可觀。然新竹莘莘學子不自滿足，更慨然以振興東華藝術為己任，率先倡設書畫益精會，……。

在此可知其人對於新竹地區的文學發展歷程似不陌生，除了肯定台灣先賢鄭、林二人鼓吹文藝的貢獻外，同時也指出改隸之後，台地文運駸駸日上的事實。

進入三〇年代，1930年10月，尾崎以台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員的官方身份，在《台灣時報》發表〈台灣に於ける地下の文化〉一文，這是繼對台灣傳說的調查研究後，又將視野聚焦於台灣遠古的地下文化，文中肯定領台三十餘年來日人對於台灣考古成果的卓越表現。11月，又於《台灣時報》

¹⁶ 參見《台灣人士鑑》（台北：台灣新民報社，1937），頁28。又，尾崎秀真有子三人尾崎秀波、尾崎秀實、尾崎秀樹，其中次子因捲入俄國間諜左爾格事件，遭絞刑處死；三子所撰〈決戰下の台灣文學〉、《近代文學の傷痕——舊殖民地文學論》，則是有關日治時代戰爭期台灣文學的重要論著。

¹⁷ 文見《台灣時報》，1927年7月號，頁104、頁106。

刊載〈清朝治下に於ける台灣の文化〉¹⁸一文，顯然尾崎已轉而留心清領時期台灣文化的相關情況。

此文原為台南開辦台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所寫，文中回溯檢討荷蘭、明鄭時期以來台灣文化發展的梗概；而在評論清代的台灣文化時，除了依照區域分別介紹其工藝、書畫美術的成果外，同時也涉及部分文學創作的表現。在中部地區，他較肯定彰化詩人陳肇興《陶村詩稿》的成就，以為是台灣三百年間較具代表性的作品；另外對於從中國移民來台的吳子光也有較好的評價，認為《一肚皮集》對於台灣文化有所影響，不過他卻認為吳氏不能算是由台灣文化孕育而出的本地文人。至於丘逢甲，雖也提及，但尾崎認為其人逃往中國，且遺稿未留台灣，加上已經去世二十年，言下之意，似不覺有肯定其人詩藝的必要。在北台灣方面，尾崎指出新竹北郭園主人鄭用錫、潛園主人林占梅是道光時期崛起的重要文化領導者，而咸豐時期較具影響力的則是板橋林本源家族，因邀請謝琯樵、呂世宜來台而大放異彩，又同時期艋舺吳希舟、大龍峒陳維英的表現也不應忽略。此外，從支那大陸渡台而來的人，尾崎指出藍鼎元、朱景英、謝曦、曹謹、沈葆楨、周芸皋、王霖等，是台灣文化史上值得一提的人物，但特別強調這些人並非台灣文化的「產物」。大抵，在尾崎眼中，台灣天然資源雖稱豐富，有若蓬萊仙境，然而從歷史的發展看來，匪亂不斷，社會未靖，因此文化的培植缺乏成熟時機，這也就是清代台灣文化/文學乏善可陳的主因。在剖析清代台灣文化的貧瘠情形與關鍵所在後，文章結尾處，尾崎強調日本領台距今不過三十六年，這期間台灣文化卻已能高度發展，尤其新時代教育的普及，已使台人中雕刻家、畫家、音樂家輩出，這無疑暗示日本與清朝治台表現的差異，且清楚標榜了日人的卓越治績¹⁹。

有了以上從文化角度所進行的清代台灣文學觀察後，1932年尾崎又發表了〈台灣の詩人と詩社〉²⁰一文，藉此提出他對清代以來台灣詩社與詩人創作表現的看法。在這篇純然以文學研究為題的文章中，尾崎的要點大致有二：其一，仍由文化、藝術的角度著眼，指出過去台灣三百年來的文化

¹⁸ 文載《台灣時報》，1930年11月號，頁20-27。

¹⁹ 以上略譯尾崎秀真〈清朝治下に於ける台灣の文化〉的內容概要。又，有關本文所引各篇日人文章，在文字解讀與意譯上，感謝政治大學中研所呂淳鈺、中文系山中美榮同學的協助，特此致意。

²⁰ 文載《台灣時報》，1932年9月號，頁144-154。

孕育，並未產生出色的藝術成就，甚至可謂毫無文藝可言，根本是「一個文學家也沒有，一個美術家也沒有」；不過，領台以來，漢詩的興盛達到前所未有的榮景，作品內容已臻進步充實，詩人、詩社的數目，與以漢詩為科學工具的清代相較，呈現出未減反增的現象。其二，簡述清代台灣詩壇概況，他認為當時台灣詩人極少，若有亦屬於中國內渡來台者，要從台灣本土找尋可稱為「詩人」者甚難，即使出現如道光時期的鄭用錫、林占梅，無論做為學者或詩人，皆無法與清代王船山、曾國藩相比，而陳肇興與陳維英也不脫台灣習氣。文末，他則再次提及上述情況已於日本領台之後顯著進步。

透過前述，吾人可見〈清朝治下に於ける台灣の文化〉與〈台灣の詩人と詩社〉二文，其實觀點頗為一致，均不脫抑清揚日及鄙夷台灣本島的書寫意涵，只是後者對於清代台灣文學的輕蔑態度較前更烈。

到了1938年，尾崎秀真再度於《愛書》發表其對清代台灣文藝狀態的看法，此文名為〈清朝治下に於ける台灣の文藝〉，雖然題目是以廣義的「文藝」作為檢討範疇，但內容篇幅其實多集中於「文學」面向。本中首先說明在進入戰爭期的今天，卻重新回顧清代台灣文藝，其實旨在警惕大眾，蓋文藝表現與國家的國力密切相關，此由「日支事變」後，瀕臨亡國的中國，其文藝更趨急速衰亡可知，是以此刻回溯清代台灣文藝梗概，也不乏「時代教訓」的意義。其次，一如往昔所論，尾崎粗暴地指出，日本治台之前，台灣曾是中國的領土，他以為會有相當多的文藝人士存在，未料在四百萬民眾中，卻是「一個書法家也沒有，一個畫家也沒有」，詩人中雖有二、三個具有水準的，但都逃回中國本土去了。另外，尾崎又依據昔年曾經刊行，當時仍存的詩文集，進以檢討清代台灣文學創作表現，他重申地方志中〈藝文志〉的作品相當貧弱，而台灣存在的文藝多數是中國來台官吏或學者所撰著，至於台灣出生的文人學者幾乎沒有成果；接著又舉出吳子光《一肚皮集》、鄭用錫《北郭園記》、李靜齋《西遊吟草》、陳肇興《陶村詩稿》、鄭用鑑《靜遠堂文鈔》、林占梅《琴餘草》、陳維英《太古巢詩集》、楊雪滄《冠悔堂文集》、吳玉麟《素村小草》、周凱《內自訟齋文集》、劉家謀《海音詩》……等作，略加簡介，並稍言及明鄭時期的台灣文學作家。

文中尾崎對於清代台灣文學/文藝依然看輕，但其所簡介之作家詩文集則較前列諸文為多，可能是因本文乃發表在以「書誌學」研究為中心的《愛

書》刊物上²¹，又或者因為連橫著述中有關清代台灣文藝的介紹已廣為週知，尾崎無法再漠視這些詩文著作存在的事實。不過，此文之書寫，論者最欲突出的重點，卻是從戰爭與國力來評斷文學藝術的優劣，一改過去文學與文化傳統相依的思維模式，如此一來，歷史、文化的長期積澱，便失去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唯有現在國力的富強，才能驗證文藝發達進步的事實，顯見尾崎的言論已然洋溢著軍國主義色彩，而其戰勝者的高傲姿態與語言暴力，彷彿透露出政治干預文學的時刻即將到來。

以上由尾崎秀真的多篇文章中，可以發現共同的論述基調，都是極盡貶抑清代台灣文學，不僅強調當時屈指可數的文人係來自中國大陸而非台灣文化的「產物」，且以為清治二百五十年間，台灣文藝/文學實不足觀；而台灣現況之得以改善，乃在日治之後。如斯話語，對於具有日本官派人員色彩的尾崎而言，不只在台人面前，表露、建構其人的清代台灣文學「知識」；他所使用的一種獨特的眼光去衡量清代台灣文學，也在隻字片語間，展示出優越感和權威意味，並輕鬆解構掉清朝帝國在台灣二百餘年的文化耕耘貢獻，也抑制了台灣自我人文發展的無限生機與可能。如此現象，相較前期伊能嘉矩在《台灣文化志》中對於清朝政府治台的文化紮根與教育養成工作的讚許，以及肯定台灣本土文人的文藝表現，無論在論述內容或書寫態度上，其實都大異其趣。

(四)

三〇年代，在尾崎秀真之外，另一位在台擔任警察的日人東方孝義²²也對台灣文學的發展諸多關心，1935年，他以〈台灣習俗—台灣の文學〉為題，在《台灣時報》連載多篇文章，依照作品體類簡介台灣文學梗概，後來相關成果都收錄於1942年出刊的《台灣習俗》一書中。從該書序言看來，可知東方孝義論著本書的目的是為記載台俗變遷，以供移風易俗的參考，進而促使內臺融合，相互理解，文學探索只是其中的一環。書中內容涵蓋層面甚廣，包括臺人之服裝、食物、住居、社交、文學、演劇、音樂、運動、趣味等。

²¹《愛書》是成立於1933年的「台灣愛書會」的組織刊物名稱，關於此會成立經過參見〈「台灣愛書會」成立小誌〉，刊於《愛書》第一輯「彙報編輯後記」，頁206，1933.6.16。

²²東方孝義於1913年渡台擔任警察，因為職業需要，開始收集台灣民俗資料及學習台灣話，1931年編纂《台日新辭典》，1942年出版《台灣習俗》一書。

透過該書所載，在文學的認知上，東方孝義有著清楚的民間文學視野；至於與清代台灣文學相關的言論，則主要集中在〈台灣文學の種類狀態〉、〈過去的教育機關と現在〉二文。他在文中肯定台灣自然環境動人，物產豐饒富庶，且百姓思想溫和，能夠表達四時情感，本有利於孕育出美好的文學作品，可惜臺人歷史不長，眼光短淺，難以發揮台灣的特色；再加上移民社會中的移民、農夫們忙於生活，而島內又五年大亂、三年小亂，百姓也就沒有能力去進行創作，至於在明清官府或縣學中的學者，其實皆從中國而來，並無台灣出生者。

大抵，東方孝義之文雖然修辭平和，但其對清代台灣文學的評價，實與尾崎秀真相近；所不同的是，東方孝義認為日本治台之後，漢文學保持著沿襲過往的型態而無成長²³，此與尾崎秀真再三強調日人領台後文運大振的說法迥異。

(五)

在前述諸人之外，另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評論者是任職台北帝國大學的島田謹二。他在三〇年代後期到四〇年代初期，曾在《台灣時報》、《愛書》、《文藝台灣》……等刊物，發表多篇有關台灣文學的論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所汲汲建構的在台日人的文學歷史圖像，以及抹煞台灣本島人文學主體性的殖民史觀，歷來討論甚多，茲不贅述。

依據目前的研究成果，發現島田的「在台內地人文學研究」始於1935年；1936年首次撰文介紹在台內地人的文學²⁴，1937年發表〈明治文學に現はれたる臺灣〉時，已在整理探索明治時期內地人有關臺灣的文藝著述，並且明白指出這是一個「外地文學史」的課題²⁵。爾後，對臺灣其他時期文學表現有更為完整的觀察論述，是在1941年所書寫的〈臺灣の文學的過現未〉及其與台北帝大文政部教授神田喜一郎合撰的〈臺灣に於ける文學についこ〉²⁶……等文。其中，〈臺灣に於ける文學についこ〉的前半²⁷論及

²³ 以上東方孝義所論與清代台灣文學有關之論述，參見其人〈台灣習俗—台灣人の文學〉，文刊《台灣時報》，1935年2月號，頁44-46。

²⁴ 此為橋本恭子〈關於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一文研究所得，筆者尚未獲見此文，此處轉引自柳書琴前揭文。

²⁵ 參見〈明治文學に現はれたる臺灣〉（上），文載《台灣時報》1937年5月號。

²⁶ 文載《愛書》第十四輯，頁3-24，1941年9月1日。

²⁷ 主要集中在該文頁7-11。

了清代臺灣文學的發展概況，正與本文之研究有關。

一如島田在各文中所持的外地文學史觀，在這篇文章中，島田與神田喜一郎分從荷蘭、鄭成功時期、清朝中國統治時期、日本統治時期，歷述各階段統治族群所創作的與臺灣有關的文學作品，並提出可從「比較文學史」的角度加以探討。至於清代臺灣的文學，島田則是從「中國文學」的角度來加以定位，他將渡海來台以及在本島出生者一律視為中國人，因此一切的文學創作自然被歸屬於中國的地方文學之內。文中，他雖肯定清朝政府相當著力於吏政，渡海來台的中國人生活尚稱安定，但又指出這些移民多為福建、廣東的莊稼人，其實無法具有文學品味或高度創作精神；且島內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也乏文人墨客的聚集雅會，所以沒有出現優秀的文豪。不過，臺灣並非完全沒有文學存在，仍有若干著述傳存至今，島田列出了別集、總集、試帖、詩鐘、詩話、隨筆及稗官小說七類，又舉出較具代表性的作家。

其中有關代表作家的介紹，他以為在台灣島出生的「中國人」，開始嘗試文學活動，大約是在清朝道光時期，其中鄭用錫、林占梅、陳肇興、陳維英等是以作為地方詩人而多少有些名氣，但島田強調這些作家們並沒有追求成為「中原作家」的力量。至於從中國來台宦遊的作家，稍具名氣的是孫元衡，雖載錄於《清詩別裁集》中，但實際還不能稱為一流作家，也很難列入第二流作家；另，尚有因朱一貴事件而來台的藍鼎元，其《平臺記略》、《東征集》雖難視為是純文學作品，但寫來遒勁有力，在與臺灣有關的散文中可算是上乘之作之一；其三，於道光年間來台著有《東溟文集》的姚瑩，是以桐城派的健將而聞名的古文家，留有許多值得傳誦的作品。

此外，在清代臺灣文學作品方面，以上的文人各有別集；而在總集部分，島田特別舉出《臺灣雜詠合刻》，以為具有鄉土色彩，值得注意。試帖方面，主要有夏之芳《海天玉尺編》、張湄《珊枝集》、楊開鼎《梯瀛集》等等，但已無傳本，只留序文於臺灣縣志及其他文獻中。隨筆方面，以朱景英的《海東札記》、徐懷祖的《臺灣隨筆》最佳，但大半是風俗史料，在文藝上只被當作素材史料來加以利用而已。

大抵說來，島田認為改隸以前的清代臺灣文藝大概「一無可觀之處」（頁9），不過他繼續說明後來文壇的概況：光緒二十年（明治二十七年）唐景崧擔任臺灣巡撫時，一時詩文榮盛，丘逢甲、施士洁、許南英、蔡國

琳輩出；唐氏更編有《詩畸》一書，別名為詩鐘，是詩歌遊戲的一種。洎自改隸以後，島田又注意到很多作家回到中國去，留下者僅有彰化吳德功、新竹王松、宜蘭李望洋等，其中王松是《台陽詩話》的編著者，後與米刀山衣洲結交；而回去中國的作家中，島田特別拈出丘逢甲一人，稱他為「改隸時的匪徒」，所著《嶺雲海日樓詩鈔》，則是「激越語」之作（頁10）。

而在小說方面，島田提及當時有將改隸事跡小說化的《臺戰實記》，可助一窺當時的局勢，另又有以服務目不識丁的民間大眾為對象，從中國系統引進的神仙故事或傳奇故事。後者，在他看來，這些作品是從中國《玉嬌梨》、《荔子傳》、《平山冷燕》乃至《演義三國志》、《西遊記》等而來，是從中國本土延伸出來的庸俗混濁支流，立足於「平俗幼稚的趣味」（頁10）之上的。上述看法，島田自言是參考大正六年（1917）平澤丁東所著的《臺灣の歌謠と名著物語》而得。

在概述了清代臺灣文學之後，島田承認臺灣也有像文學一樣的遺產出現，然而當時的作品，即使是再怎樣好的佳作，由受過精緻、深刻、雄大、複雜的近代文學趣味薰染之下的人們看來，「並沒有令人十分滿意的作品，文學價值也大部分都不高」。（頁10）

從島田此篇具有歷史鳥瞰意味的文章中，可以發現，在文學史觀上，如同他以日本內地文人在台創作的文學記錄替換臺灣本島文人的文學軌跡一般，他將清代臺灣文學視為中國文學的一部份，完全以中國文學的立場與位階來觀察品評臺灣的文學狀況，自然無法如前述伊能嘉矩一般，可以發現兩者存有差異與轉化之處。而在評價清代臺灣文學的藝術表現，他分由古典詩文及民間文學兩面著眼，以為在古典文學方面，似乎「一無可觀之處」，大致與尾崎秀真、東方孝義看法近似；而即使是整體評論詩文及民間說話、俗謠，也認為「沒有令人十分滿意的作品，文學價值大部分都不高」。

（六）

以上筆者嘗試爬梳、歸納日本領台以來，日人有關清代臺灣文學的重要論述，雖然已舉出伊能嘉矩、尾崎秀真、東方孝義、島田謹二等人之作，但在諸人之外其實尚有多位撰寫過相關文字。

如古槐書院主人諸田維光²⁸，在明治41年（1908）至42年（1909）間發行《南瀛遺珠》叢書，輯中選出若干清代台灣文獻進行譯註，如第一輯選有《續修台灣府志》、《淡水廳誌》、《淡水廳誌訂謬》、《噶瑪蘭廳誌》、《平臺記略》、《鹿洲初集》等作，第四輯則專就《裨海紀遊》標記說明。依諸田維光所言，《南瀛遺珠》選擇這些與台灣史地密切關係的地方志或文集刊行，是為了「以供於官府治台，與野人遊台之參考耳」²⁹。

再如，山中樵、前島南央、市村榮分別於《愛書》上發表〈六十七と兩采風圖〉、〈赤崁採訪冊〉、〈台灣關係誌料小解〉諸篇，這些是屬於書誌學式的研究成果，對於若干清代台灣古籍的版本、內容亦有簡要的說明。

另外，田大熊在1938年，發表於《愛書》第十輯上的〈陳維英と太古巢とその聯集〉，對於陳維英的生平、太古巢名稱的由來、陳氏的聯文作品，有較為詳細的考訂與辯證工夫；1940年，西川滿在〈赤崁記〉中對陳維英詩作加以品評月旦，1942年改寫郁永河《裨海紀遊》為小說〈採硫記〉，也隱含了其對《裨海紀遊》的實踐批評與審美判斷。而1941年，《愛書》第十四輯所刊池田敏雄與黃得時合編的〈臺灣に於ける文學書目〉，則是對於領台之前的臺灣文藝書目進行概略介紹，所附作者小傳及版本說明，可視為文獻之導讀。

綜觀上列各文，郁永河《裨海紀遊》與台北詩人陳維英及其作，似乎是殖民地日人頗感興趣的作家、作品，相關現象可再進一步觀察探討。而諸文與前述伊能嘉矩、尾崎秀真、東方孝義、島田謹二等人之論述相較，或屬單論，而非系統性的思考論述；或僅側重介紹單一作家及其作品內容，並無歷史沿革背景的說明；或屬書誌學式的探討，只強調版本與館藏情形，但因大多缺乏明確史觀，故與伊能嘉矩等人之論述性質有異，唯仍有助掌握日人對於清代台灣文學的熟悉情況、閱讀能力與興趣趨向。

以上透過日治時期報章雜誌、書籍的爬梳，筆者初步勾勒出日人對於

²⁸ 諸田維光，字明卿，一字公熙，號竹崖居士，又號古華山人。姓源諸田氏，東海道武藏人，嘉永癸丑（1853）九月生於江戶櫻田，明治33年（1900）應總督府民政局之邀來台，於明治40年（1907）退職。在台時，寓居艋舺一代，設有古槐書院，收藏新故圖籍及手錄譯纂諸稿本；又於大正6年（1917）籌倡「麗澤會」，鼓吹日台文人以文會友。

²⁹ 語見陸鐵叟〈續續鳩居歌自序〉，文載《臺灣日日新報》，大正3年6月28日第5043號。

清代台灣文學觀察論述的系譜建構，從中可以發現日人對於清代台灣文學進行評述，開始時多是附麗於民俗或文化研究的考察之上的，到了後期，較能轉從文學研究的角度出發，去品評當時的文藝表現，不過評價卻是普遍甚低。

三、帝國主義與知識生產

(一)

對於日人而言，台灣曾是陌生的異域，如何接手此地、掌控此地，一系列「台灣知識」的建構，無疑具有推介與引導的功能。而在文學表現上，台灣究竟有過何種發展概況？日人應當如何看待這片新收復的殖民地的文學？台灣文學與日本文學間將會產生何種互動關係？由於前述伊能嘉矩、尾崎秀真、島田謹二等人多半具有官派人員的身份，因此其人有關「清代台灣文學論述」，也極容易形成具有權威性的論述話語。那麼這些染有官方色彩的清代台灣文學知識的建構，背後蘊藏何種義涵？對於日人統治台灣又有何影響？

其實早在 1916 年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完成初稿、1928 年出版以前，日人已經思考過台灣文學定位的問題。1905 年 9 月，臺灣慣習研究會的會員蘇來，撰文介紹內地文人後藤外氏的「文壇地方分權」意見，並強烈肯定此議「旨趣合乎時宜，是近來少見的高論」。依蘇來所述，後藤氏的想法如下：

談到我們希望如何實現文壇的地方分權，而畫出理想的文學勢力分佈圖一看，就會成立以東京為中心的關東文學圈；以京阪為中心的關西文學圈；以岡山為中心的中國文學圈；以熊本為中心的九州文學圈；以新瀉為中心的北越文學圈；以仙臺為中心的東北文學圈；以全澤為中心的北陸文學圈；以出雲為中心的山陰文學圈；以高知或松山為中心的四國文學圈；以札幌為中心的北海文學圈；以臺北為中心的臺灣文學圈這種自然的區劃，各自發揮特長，相攻相磋，造出大日本式的大文學，以貢獻世界的文運³⁰。

³⁰ 後藤外氏有關台灣文學定位的意見，參見蘇來〈應該如此才對〉，文見《臺灣慣習記事》

上述文字，清楚顯示在後藤外氏的規劃中，台灣文學已被收編為日本文學的一翼，而這個新收復的殖民地文學，也將是創造大日本文學、貢獻世界文運的一份寶貴力量。

對於後藤外氏的見解，蘇來頗為推崇，且又進一步加以闡釋，他以為：

台灣文學的特點，在於它使南清文學的趣味純粹地發達到某一程度的傾向，以及在原始文學的研究上，目前能抓住馬來人種的趣味這兩大要諦，有充分能夠在日本文學上增添一種勢力。其一大圈設立在天南一方稱霸，想必有十分的價值才對³¹。

台灣文學之與日本各地文學互有特長，而此一特點，正在於蘊涵南清文學及馬來人種文學的「趣味性」，而他更看好台灣文學的這種特點，得在日本南方文學圈稱霸，為日本文學增添一種勢力。此種詮釋，不僅凸顯了台灣文學在日本文學內的角色定位問題，也暗示了未來在台日人應該努力創作或挖掘具有「台灣趣味」的作品。

那麼，所謂「台灣趣味」究竟何所指呢？在蘇來之後，臺灣慣習研究會幹事小松吉久隨即撰文予以說明，文中並逕以「殖民地文學」指稱台灣文學，其內容如下：

近年有所謂殖民地文學者，聽說在德國逐漸受到歡迎。原無藉此殖民地文學而予以揚名的想法，但在將來總會在文學上看到有關殖民地的詩或散文的刊載。因此，自認原在殖民地的地方色彩、氣候、人情、風俗習慣以及其他很多地方，總與本國有其不同的風趣，隨而足以發揮其在文學上特殊的興趣與光彩。……位於我日本帝國南方殖民地之台灣與日本本土，在自然與人事上有其各種不同的地方，……在文學上亦將順著自然趨勢可帶來特別的風趣與光彩。換句話說，舉凡詩、散文也好，均因有其不同的自然及人事之描繪景色、敘述事物與感情為主，自然而然會發揮出所謂台灣興趣的一種特殊風趣。……而所謂風趣者，僅靠書籍文物或人際關係，還是不能徹底瞭解，無論如何，非到殖民地去體會，則實難以得到其真象。因此要發揮台灣風趣，就非由現居台灣或至少到過台灣而已了解實地情形者，則實無法做到。

中譯本（5：9），頁 134。

³¹ 語見蘇來〈應該如此才對〉，同上註。

是故，所指臺灣的殖民地文學，就自然成為這些人的任務。……如要反問，對於殖民地文學已否達到充分發揮時，自覺慚愧，而不得已回答「否」字。……日本本土的人，因尚有不知如何區別土匪與生番者居多，所以在文學上希望其發揮臺灣風趣之要求，可以說難上加難，故予擱置不談。那麼就臺灣現況說，應傳知殖民地的臺灣之真相，使其引起大家感到興趣，藉以加強日本本土與殖民地間的緊密關係而言，本人常以為是乎覺得正是一大缺陷。……凡會執筆從事寫作者，雖非專業，也切望其在此時，更加努力發揮臺灣風趣，以資顯示殖民地文學的效果³²。

由此看來，臺灣風趣或臺灣趣味的創作應該是植基於臺灣風土而成的。而小松吉久的文章，除了解釋臺灣風趣或臺灣趣味的指涉意義外，他更強調來到臺灣實地考察的重要性，且有感於日本內地之人多半不知臺灣狀況，因此呼籲加強日本內地與殖民地間的聯繫，以為應當多多傳知臺灣的真相。

透過上列後藤外氏、蘇來、小松吉久的相關敘述，吾人可以初步掌握領台初期日人看待臺灣文學的立場與角度，其一，清楚指出臺灣文學是日本文學的殖民地文學，屬於本國文學的一支；其二，肯定臺灣文學有其獨特處，其間存有臺灣趣味，但也強調此特點可為日本文學增添勢力。在如此的思維模式下，所謂臺灣趣味的追求，本質上仍然不脫殖民者的支配機制，只是藉著異國情調的敘事方式，去逢迎自己的好奇心，而在有意無意間模糊掉統治者在被殖民者心中的帝國權力印象，甚而驅散或掩飾其征服的暴力罷了。

(二)

從以上的說明可知，日人在統治臺灣十年後，已經清楚意識到將臺灣文學收編入日本文學的必要，那麼身為臺灣慣習研究會幹事的伊能嘉矩，對於前述會員所發表的臺灣文學言論，自然十分熟悉。在這樣的情形下，伊能嘉矩的清代臺灣文學知識的建構，究竟呈顯出何種意義？他如何將臺灣文學與日本內地文學作一連結？又如何掌握臺灣文學的趣味性？

³² 參見小松吉久〈殖民地文學・臺灣風趣的發揮〉，文見《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5：10），頁153-155。

誠如小松吉久的焦慮一般，在1905年時，日本內地對於台灣事物仍然諸多不解，那麼想要把新收編的殖民地臺灣，完全轉變成日人的「家園」，顯然困難重重。而長期以來，伊能嘉矩就以其探險家、人類學家的角色，透過旅行、調查、發現、書寫的步驟，逐漸建構出他對此一陌生疆域的一系列啓蒙論述，《臺灣文化志》就是最重要的累積成果。

從伊能在《臺灣文化志》中有關清代臺灣文學的書寫來看，他大量透過清朝遺留下來的文獻材料以及時人著作、報刊資訊，並在文化研究的視野之下，展開其人的清代臺灣文學論述。這種因著重文化而涉及文學的研究視角，能夠「再現」清代臺灣文學的真相嗎？眾所周知，「文化」常與近代的帝國主義經驗並論，伊能在探索清代臺灣的文化梗概時，是否能夠避免投射其人的帝國主義色彩？筆者曾經提及，在其有關清代臺灣文學的論述中，伊能客觀承認清朝政府領台、治台的事實，而如同其從事臺灣原住民研究時，對原住民教育的強調與重視一般，他在勾勒清代臺灣文學時，也是循著清代臺灣教育此一焦點而開展的；特別是在敘述清代臺灣文人及其文藝/文學表現時，更加側重文人可貴德行的歌頌，以及肯定清代在台官員的教育政績與功效。這種強化教化功能重要性的書寫模式有何特殊意義？其對人品薰陶、教化啓迪的重視，與文學/文化研究又有何關連呢？

對於日人而言，倘若如小松吉久所言，在1905年時內地人士仍對臺灣事物感到陌生，則形塑出一個能令日人了解的臺灣形象自是重要。因此，藉由伊能的論述所生產、傳播的臺灣印象，對於在台日人或內地人士，都將是一種知識的獲得與建構。現在，讓我們再次回顧伊能以教化為重的敘述模式，如其《臺灣文化志》第二章〈教學之鼓勵與藝文之振興〉起首有言：

台灣在清代二百年間，不問其在官抑在野，均致力於教學之鼓勵，並努力於藝文之振興，其為一代之師表，而興起後賢著有功績之士，不乏其人。（中卷，頁37）

以及第三章〈右文間接之影響〉：

台地古來稱為海東之鄒魯，因此其所在非無寓賢隱逸之士，匿采韜光之痕。或為席豐好禮，或為安貧樂道，為此「副國家養士之隆，右文之化」之間接影響者所及者匪鮮。（中卷，頁49）

如斯的介紹，其實形構了一個頗具教化傳統與涵養，以及可被教化的臺灣意象，不過這樣的論述，也暗示了臺灣具有從「可被教化」到「被馴化」的可能空間。此種有助達成殖民目的的「臺灣知識」，對於一個正在摸索認知殖民地的日本帝國而言，無疑創造出一種安全的幻想，和可被期待的想像視野。透過這樣的觀察，我們可以了解，在伊能看似客觀而合乎學術的論述中，仍然潛藏著帝國主義的思維結構。

至於其在「台灣趣味」一事的掌握上，伊能嘉矩在《臺灣文化志》的第七章〈人文之特殊發展〉中，曾深入剖析臺灣與中國間既同又異的文化/文學現象，顯見他能清楚掌握到臺灣地理空間所孕育的本地風土精神。不過，由於日人對「臺灣趣味」的重視，是在殖民者的心態與本位立場下建構出來的，因此他在《臺灣文化志》中所強調或分析的清代臺灣文獻，往往也偏重於記錄臺灣史地資料而有益統治需要的《裨海紀遊》、《東征集》、《台海使槎錄》及各地方志……等書；特意推崇的清代臺灣文人，也是藍鼎元、劉銘傳、沈葆楨等具有治台經驗的人士，則其「臺灣趣味」的看重，也與殖民目的相連結。因此，當他看到王松《台陽詩話》作品時，與鄭如蘭序中對王氏持恭處世節操的稱頌，或林輅存跋語「有是哉，臺猶未亡」的滄桑感慨不同，伊能側重的是：

受贈新竹文人王友竹兩冊「台陽詩話」，該書行文雅潔，詩趣豐富，不只為詩話佳作，更可喜者則在文學上臺灣詩文趣味在漢學界開拓嶄新風貌³³。

他更為推許詩話中所隱含的「臺灣趣味」。另外，筆者雖然指出了伊能嘉矩的帝國主義位階式的思考，不過他在看待具有臺灣趣味的創作時，並未抹煞臺灣本島人的創作能力，從王松的事例可知，伊能相信臺人也可在文學上發揮臺灣趣味，此與日後島田謹二在書寫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完全以日人為主體的寫法，大不相同。

(三)

不過，並不是所有的日人都認同、接受伊能嘉矩的清代臺灣文學知識，隨著日人統治時日愈久，日人對於清朝在台的治績與耕耘，就愈趨否定態

³³ 參見梅陰生明治39年1月23日的「慣習日記」，文刊《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6:1)，頁51。

度。

從三〇年代尾崎秀真數篇論及清代臺灣文學的文章看來，他是最懂得「訴諸過去是詮釋現在的最佳策略」的人。不管是從文化或文學的角度著眼，尾崎認為清代的台灣是一個沒有文藝/文學表現的地方，即使有，也是中國的「產物」。換言之，尾崎不同於伊能嘉矩對清朝政府治台政績的承認，以及對臺灣歷史、空間培育人才的能力的肯定，他在多篇文章中屢屢以為清代臺灣的文化/文藝表現貧瘠，不值得一提，且措辭語氣充滿鄙夷。相較伊能嘉矩憑藉豐富清代臺灣文獻資料而得的論述結果，尾崎的文中，常以粗糙而極少的材料，去重構清代臺灣文學的情況；而更令人側目的是，其人極力凸顯清代臺灣的乏善可陳，卻又時時強調日本治台不久後臺灣就有突飛猛進的改革論調。這種化約的敘述話語，並非出自縝密的分析，而僅是憑藉帝國權力的優勢，所作的衍申與推論，就如其在戰爭期發表於1938年的〈清朝治下に於ける台灣の文藝〉一般，他以戰敗的支那的國力，斷言中國文藝的急速衰亡，並藉此回溯清領時期臺灣的文藝也當然同樣不堪。總括而言，尾崎秀真有關清代臺灣文學的言論，彷彿存有一套固定的修辭模式，他慣從日人本位出發，並採用文明/啓蒙的論述口吻看待臺灣，在每一個論調中，解構清朝中國政府的力量，進而模塑出日本官方的威望，成功界定了日本統治者的高姿態和影響優勢。相較伊能嘉矩而言，尾崎秀真的想法，無寧存在著以「日本對臺灣的影響力」來取代「中國對臺灣的影響力」的論述思維，這樣的修辭，政治色彩昭然若揭。

不過，尾崎秀真的觀點，似乎更是三〇年代及四〇年代間日人的主流論述基調，東方孝義與島田謹二對於清代臺灣文學的看法，也與尾崎秀真所論大同小異。特別是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對於臺灣文學主體論述的建構，其戕害程度比起尾崎秀真更顯激烈。

原本，島田謹二在〈臺灣に於ける文學について〉中探究清代臺灣文學時，他比起尾崎較能肯定清朝政府致力民治的成績，也能列出若干作家、作品加以說明，但由於其人出於統治者立場的史觀所致，使得通篇論述轉為激進，他清楚地以「殖民地」來標誌定位臺灣，將臺灣「虛位」化，認為清代臺灣文學是中國人在台的文學，而日治時期自然也是以渡台日人的文學成就為主。在他的思考下，臺灣文學成為歷來各國統治者的文學，完全失去主體性，任人宰制；而臺灣島上出生的人，成了沒有靈魂、沒有聲音的人，徒然生息於這個地理空間罷了，既難躍登於文壇之上，也乏參與

改造文學/文化的可能，一切的書寫都掌握在統治者手中。於是，在島田謹二的論述中，他高度發揮統治者的言說權力，任意形成忘我的愉悅論述，削弱臺灣本島人的地位，使之徹徹底底淪喪為被殖民者的身份。

再者，前曾提起的，明治時期頗為看重的「臺灣趣味」問題，在島田〈臺灣の文學の過現未〉中，又繼續加以闡述說明，除了肯定以「臺灣趣味」出發所書寫的文學作品可作為日本南方外地文學前進的重要動力外，也觸及了創作方法的問題，提到寫實主義文學的書寫，由於所述已涉入日治時期，超過本文研究範疇，在此不予深論。

至此，我們重新省思明治時期到昭和時期，伊能嘉矩、尾崎秀真、東方孝義、島田謹二等人較具歷史視野的清代臺灣文學觀，倘若從帝國主義與知識生產的互動關係加以考察，將會發現從伊能嘉矩因強調教化目的而忽略文學的論述，到尾崎秀真抹煞清人努力、鄙夷臺人、膨脹日人表現的意見，乃至東方孝義認為清代臺灣並無本島出生的文人的化約批評，以及島田謹二以殖民地虛位化臺灣，遂使臺人失去文學舞台的作法，這種對清代臺灣文學歷史的「改寫」過程，在在顯示，其間存有帝國運作的鑿痕。而諸人更挾著官方人員的身份，以優勢的帝國主義敘述觀點去經營臺灣的文化/文學想像，進而再將這些生產的知識與日本帝國知識網絡連結，納異地異民於內地之中，遂使臺灣島民從原本屬於他們的歷史位置遷移出來，並承認日本意識型態下所重構的清代臺灣文學評價系統，卒至淡忘我族的真正歷史，失去透過主體性的建構而能獲致的解殖能力。

另外，藉由以上諸人的清代臺灣文學論述，我們不僅可以得見官方介入的權威性的建構，而從歷時性的考究中，我們還可發現，其人的詮釋位置更與統治時機、目的相繫。在統治前期，為使更多日人投入經營臺灣的工作，伊能嘉矩暗示此地是一可被馴化的空間，以及臺灣島人的可被教化性，對於內地人士而言，自有勸說鼓勵的意義。而一旦統治勢力確定，為求長治久安，鞏固治權於不變，三〇年代的尾崎秀真，已然將其言說的對象轉向臺灣島人，先是著力於去中國化及宣示展現日本威權，更在1937年後的戰爭期，從國力的盛衰來論文藝的優劣，頗有警示臺人的教訓作用。而同時期，東方孝義的研究也以內台融和為務。到了進入戰爭後期，島田謹二逕以「外地文學」稱呼臺灣文學，相較明治時期後藤外氏所主張的「文

壇地方分權」，或時人所稱「將臺灣獨別成立為一文學性地方分權中心」³⁴的作法，島田採用「外地文學」一語，不無再次宣示臺灣為日本殖民地的意味，缺乏日治前期日人嘗試將臺灣與日本其他地區如東京、京都……等地平等看待的態度了。

四、文學視角下日人論述的意義

綜觀前列日人有關清代臺灣文學的系統論述，倘若不從帝國主義運作機制去考量其中書寫的意涵，而純從文學角度去解讀，則日人對於清代臺灣文學的相關批評以及觀察視角的開拓，仍有值得留心之處。

例如總評清代臺灣文學的藝術表現，尾崎秀真、東方孝義、島田謹二等人持負面評價，雖然持語不免有過於粗率之嫌，但觀察各人所持理由，略有三點：一是臺灣天然環境雖佳，唯清領時期匪亂不斷，社會難安，缺乏創作環境；二則由於臺人歷史不長，眼光短淺，難以彰顯臺灣特色；三從社會本質看來，移墾社會之下百姓忙於生活，自然也會影響文學創作。以上三點，不妨視為日人對於清代臺灣文學環境的認知論述。

其次，有關清代臺灣作家的評價問題，普遍而言，早期清代臺灣本土文人較受重視的是竹塹鄭用錫、林占梅，以及彰化陳肇興、台北陳維英等，後期則有施士洁、丘逢甲等。至於中國渡台文人，則有藍鼎元、陳夢林、吳子光、劉家謀、姚瑩、唐景崧等較受矚目。究中，受制於論述者的個人偏好，或審美感受的差異，在作家/作品評價上，自然也會有所不同，譬若伊能嘉矩，他平生最為看重的本土文人是竹塹鄭用錫，伊能在《臺灣慣習記事》第三、四卷中（3：12、4：1、4：2、4：5、4：6），連續發表五篇文章大力讚揚其人其事其作，並稱之為「淡北之偉人」，而如此推許的主因是感佩其人片刻不離經世濟民的胸襟。不過，相較於伊能對鄭氏詩歌的高度評價，連橫則以為「平淡」³⁵，顯然看法有異。

再者，日人在研究清代臺灣文學時，不只留意了古典文學的創作表現，也能兼及民間文學的範疇，此等研究視野甚是難得，比諸王松《台陽詩話》、

³⁴ 語見月旦子〈臺灣學術界之三十九年史觀〉，文載《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7：1），頁30。

³⁵ 參見連橫《臺灣通史·鄉賢列傳》（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79），頁968。

連橫《臺灣通史·藝文志》、《台灣詩乘》或黃得時〈臺灣文學史序說〉之偏重於臺灣古典詩歌之作，更能雅俗並蓄。又，島田謹二在概述清代臺灣文學時，特別拈出七類作品，並就代表作家加以介紹，顯見其人對於作品體類的重視，此在向來以作家為中心的書寫模式中，倍顯新意。

另外，筆者最感興趣的是，伊能嘉矩從民俗文化的角度出發，藉由多個古典文學及民間文學文本的比對，發現臺灣地理風土具有涵攝中國文學使之轉化為臺灣文學的現象，進而證成臺灣人文有其自我特色。伊能此等觀察視角，以及剖析研究的取徑，不僅出現有跨文類研究的現象，尤其開啓了清代臺灣文學在中國文學影響下猶能建構主體性的可能，最是耐人尋思。

整體而言，若從文學視角審視殖民地時期日人有關清代臺灣文學的論述，相關成果較為詳實可觀者，仍然以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為最。不過，在臺人眼中，不免有所侷限，楊雲萍在1941年稱許伊能嘉矩為「臺灣研究的碩學」同時，就針對此書指出：

直接記述臺灣文學者只有第三章，而且視之為『間接右文之影響』。此為今日吾人最不滿意者，亦為《臺灣文化志》中最考究不足的部門，但應對所有的方面都求全責備，此勿寧是後人所應開拓者。³⁶

以為伊能對於文學著力不足。那麼，遑論其他了！

五、結語

數年來，當吾人言及日治時代日人有關臺灣文學的論述時，常會聚焦於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實際上在其之前，早有多人發表過相關文字。本文嘗試以「殖民地時期日人眼中的清代臺灣文學」進行考察後，初步發現島田之外，伊能嘉矩、尾崎秀真、東方孝義……等人也曾有過重要言論，值得深究。此外，在建構日人有關清代臺灣文學論述的系譜時，筆者更留意到日人對臺灣文學的收編早在明治時期便已進行，即後藤外氏所

³⁶ 語見楊雲萍〈臺灣研究の碩學 伊能嘉矩〉，文載《臺灣時報》253期，1941年，頁76-77。而此處本文所引中文譯稿，見吳密察〈從人類學者到歷史學者〉，收入夏麗月主編《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特展專刊》，頁31。

謂的「地方分權論」或小松吉久倡議的「殖民地文學論」，皆將臺灣文學視為日本文學的一翼，而二人主張均獲得熱烈迴響與實踐³⁷。

不過，不只在本質上，明治時期的日人已將臺灣文學明確定位為日本文學的一環；甚者，在其後統治時期的各階段，日人進行重構、整理臺灣早期的文學歷史記憶時，更可發現其間存有帝國主義與文學研究間的錯綜複雜關係，尤其若干具有官方色彩的發聲，其實隱藏著某種詮釋目的與書寫策略。而日人的這些論述，透過其所掌控的大眾媒體刊出後，往往容易成為「專業知識」，對於臺人而言，如此的優勢，自是輕易佔據了文化生產的敘述結構，進而形成文化霸權。所以日後當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提出後，黃得時才會想要重新審視帝國強權下的異己論述，並對此做出抵抗。

當然，臺人對於日本文化霸權的抗爭，也絕非從黃得時與島田謹二的臺灣文學主體性的詮釋爭奪戰才開始，王松《台陽詩話》、連橫《臺灣通史·藝文志》、《台灣詩乘》，以及後來一連串以「臺灣」命名的刊物《臺灣文藝叢誌》、《臺灣詩報》、《台灣詩薈》……的創辦，在日人治台初期鼓吹的「臺灣趣味」的風潮下，也巧妙地利用殖民情境下原本對立文化的重疊之處，作為一種共存且互相抗爭的場所，而漸漸開展出屬於臺人的一席生存之地。

但，值得再予注意的是，當時的臺人不只對於日人的臺灣文學論述感到不滿，在歷經長期的嘗試與努力後，他們也會坦誠檢討臺人自我的論述，如1943年，楊雲萍曾撰文猛烈砲轟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史序說〉，對於這篇在今日被視為最能建構臺灣文學主體性的文章，在楊氏心中卻不過是出自剪刀漿糊的作品，其中頗多資料採自他人成果，包括臺灣愛書會刊行的〈臺灣文獻圖書目錄〉、市村榮〈臺灣關係誌料小解〉、連橫《台灣詩薈》第三號的〈遺書附刊豫告〉的廣告……等；此外，楊氏更發現其中存有不少誤讀資料的現象，或沿用前人錯誤卻習而不察之處³⁸。從楊氏如此的批判，以及細繹其人先前在《愛書》、《文藝臺灣》、《臺灣藝術》等刊物上，所發表的多篇有關臺灣文學作家、作品（所論如劉家謀、陳維英、楊浚……等）的評述文字看來，楊氏對於台灣文學的研究或撰述方式，在其

³⁷ 此看法參見月旦子〈臺灣學術界之三十九年史概觀〉，文載《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7：1），頁31。

³⁸ 詳見楊雲萍〈糊と鉄と面の皮—黃得時氏「臺灣文學史序說」を讀む〉，文載《文藝臺灣》第六卷第五號，1943年9月1日。

心中自有其理想範式。

以上種種有關臺人與日人間文化霸權的抗爭歷程，或是臺人間在建構臺灣文學論述時的角力情形，多少亦與本研究主題有所關連，但限於篇幅與精力，將俟來文再探究竟。

第五屆「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
【鄭成功、劉銘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3年4月25~26日

日治時代臺灣古典詩中的劉銘傳

——以櫟社徵詩（1912）作品為討論範圍

廖振富

台中技術學院副教授

壹、前言

劉銘傳（1836~1896）與台灣關係至為密切，從1884年中法戰爭受命督辦台灣軍務，擊退法軍，到1885年台灣正式建省後擔任首任巡撫，任內大興洋務，建樹頗多，是帶領台灣邁向近代化的先驅人物，最後卻因故請辭離台，事在1891年。清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廷擬再度起用劉銘傳辦理海防，被他婉辭，次年五月，日本打敗中國，清廷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次年元月劉銘傳病逝故鄉，得年僅五十九歲。

日治時期的台灣古典詩，有相當多以劉銘傳為描寫對象的作品，反映出當時知識分子對劉氏的看法。其中筆者發現有兩次分別以〈追懷劉壯肅〉、〈劉銘傳〉為題的公開徵詩活動，此二題目前留下百餘首長短不一的作品。前者在1912年由當時最負盛名的詩社「櫟社」主辦，是該社為慶祝成立十週年而舉行大型詩會，會前公開徵詩的兩個詩題之一（另一詩題為〈笨港進香詞〉）。後者則是1922年由台灣留日學生創辦的文化啓蒙刊物《台灣》雜誌主辦，是該誌辦理第一期公開徵詩的題目，共刊出作品七